

《北京大学学报》研究

罗 珊

摘 要：本文以《北京大学学报》自1955年至2016年60年间发表的涉及民俗的各学科论文为对象，从跨学科的视角，主要从民俗学的视角切入，分析民俗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联系，同时也观察在 multidisciplinary 的交互影响下所形成的民俗学学术问题、交叉学科组合结构和成果形态。

关键词：北京大学学报 跨学科 整体文化观 民俗学

研究综合性大学的学报是一项值得开展的基础研究，其中《北京大学学报》具有代表性。《北京大学学报》^①，双月刊，1954年由时任校长的马寅初先生决定创办，1955年正式创刊。1965—1972年期间停刊，1973年复刊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学报》，至2016年年底，合订本共计53卷。本文选择北大学报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理由有三：一是北京大学作为我国最高学府人文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具备研究成果的领先性和前沿性。1954年11月6日，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校刊》上发表的《关于出版〈北京大学学报〉的决定》第一条中谈到出版《北京大学学报》的初衷：“为了传播我校科学研究的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辩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②。二是由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传统决定。1919年由蔡元培校长主持创办的

① 本文使用的资料源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2016年涉及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各学科文章，以下为阐述简明起见，在本文的部分正文中，所使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文章，在不影响读者理解原文的前提下，简称“北大学报”。

② 许智宏：《〈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庆典致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5页。

《北京大学月刊》可算作《北京大学学报》的前身^①。发展至今的北大学报，在其编辑部的官方网站上发出的刊物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应可以理解为编者对学报发展的期许：“北大历史上有创办社会科学名刊的好传统。其中《新青年》、《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要继承发扬光大北大优良的学术传统，努力做到同北大历史上的学术名刊一脉相承。”^②三是在 20 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起步，兴起中国民俗学，这段历史与《北京大学学报》对民俗学研究成果的持续反映相接续，可以成为研究该学报的一个独特视角。作为一份综合性大学的学报，《北京大学学报》还拥有跨学科的视角，这也给这一研究提供了整体学术文化背景。本文以该学报自 1955 至 2016 年 60 年间发表的涉及民俗和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多学科论文为对象，开展这方面的初步研究。

一、《北京大学学报》与民俗学

民俗学，狭义地看，与文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相对小众。但若广义地看，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也在民俗学讨论的对象范围之列。在对民俗学的广义理解上，今天民俗学者基本保持了这样的默契，认为“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③，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以钟敬文为代表的民俗学者还有一种更宏观的看法，认为民俗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有机体的各个层面，对民俗问题的研究，可以涵盖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究其根本，民俗学

① 参见许智宏：《〈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庆典致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6 期，第 5 页。

② 《创世界一流大学，办中国社科名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站，<http://journal.pku.edu.cn/CN/column/column290.shtml>。

③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5 页。

的研究是建立在民间文化上的研究，是对民间社会文化现象和民众心理的追溯和探求。民俗学既不应自我封闭，也不应过分自我设限。在一定程度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几乎都存在这样的诉求，而民俗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其民众视角和对民众日常生活的侧重研究。

在对近六十多年来《北京大学学报》的发表成果梳理中，民俗学、民间文学相关的研究文章所占比例并不大，大体不超过 20 篇，但其中不乏相当有分量的文章和著名学者，例如，向仍旦《史树青讲“从〈风俗通义〉看汉代的礼俗”》（1963 年第 1 期）、屈育德《传奇性与民间传说》（1982 年第 1 期）、钱理群《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及国民性考察》（1988 年第 5 期）、李四龙《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1996 年第 4 期）等。既有早期的对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科介绍，有学者研究梳理，也有专题研究，但总体涉及范围仍不够广泛，在该刊物上产生的影响也有限，这与研究阵地有关，也与近几十年民俗学自身发展的状况和历史语境相关。“五四”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白话文运动的推行，中下层市民文化、民俗文化受到了极大重视，也得到了广泛研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下，对民众的关注和民间文化的肯定上升到新的高度，也由此产生了带有时代特色的学术成果。在这层意义上，民俗学、民间文学进入大众和学者视野、重回热议的焦点，始终与建构“国风”和建构国家与民众关系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进入 80 年代，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大量对西方学术思想的译介和实践研究重新活跃起来，新的学科和研究方向不断涌现，占据了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大部分空间，对民间文化相关研究不似从前热度，但时代的发展也使得民俗学的研究得以摆脱阶级性论的束缚，进入更系统、科学的研究。

当然，宏观观察民俗学研究的主题，《北京大学学报》历年发表文章涉及于此的题目，远不止上述提到的数目，下文将谈及的几个方面均是与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有所交叉的学科研究，以跨学科的角度进行观察，既便于打破现有研究分类进行合作交流，也有利于更加

准确看到民俗学自身在学术系统中的定位。

二、《北京大学学报》中的国学与民俗学的关系

民俗学与国学的关系历来深厚，中国民俗学之兴起，与国学研究兴起密切相关。“国学”的名称是晚清时期为抗衡“西学”而提出的相对应的概念^①。广义上，国学泛指中国固有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涉及中国文献的许多学科。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创立，国学门下设有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等分支机构。可见在当时，民俗学研究（包括歌谣、风俗、方言等）是隶属国学研究一支的，尤侧重对民间文化的搜集、记录和整理。顾颉刚在《国学门周刊》的《始刊词》中曾为歌谣、风俗研究正名，他认为，“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所以，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②，由此将风俗研究带入了学者研究的视野和范畴。面对中国民间极为丰富的民俗资源，无论史料记载还是民间采集，都极富本国文化的独特色彩，因而成为国学关注的一部分。尽管现在民俗学已经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但在许多根本性的认识上，对国学的阐释也同样适用民俗学的观点。

现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主要阵地集中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1990年代编辑出版的《国学研究》学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在国内学术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从北大学报哲社版上有关国学的文章中也能

① 程毅中：《试论古代小说与当代国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8页。

②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1月6日第13期，第1页。

对此窥见一斑。在《国学研究》编辑出版后，《第一等的学术——〈国学研究〉第一卷读后感》（1993年第6期）、《弘扬中国过去面向世界未来——〈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发言选登》（1994年第6期）等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其中，《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发言选登中，刊选了袁行霈《开放的国学与开放的〈国学研究〉》、季羨林《国学、政治和二十一世纪的“匾”》、邓广铭《漫谈传统文化及其弘扬问题》、傅璇琮《拓展各学科史研究，丰富国学内容》（1994年第6期）等内容。

袁行霈曾在《国学研究》的《发刊词》中谈到，“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国学也是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学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①。在1994年《国学研究》第二卷的出版座谈会上，他对这段话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这段话可做两方面的理解，“一、国学具有时代性，并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而更新；二、国学并不囿于本土的学术、文化而对外来的东西一概排斥，例如佛学从东汉传入中国后已被吸取融汇成为国学的一部分”^②。2008年，在《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一文中，在面对如何继续发展国学及如何使国学在当代发挥作用等问题，袁行霈从两个层面进行了阐发，一是作为世界大格局的一部分，“应当自觉地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放到世界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③，二是与日常生活相关联，“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④。

在曾经国学的概念中，将民俗学纳入国学研究的框架体系，是对

① 袁行霈：《开放的国学与开放的〈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卷，第14页。

② 同上。

③ 袁行霈：《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4页。

④ 袁行霈：《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转引自：袁行霈《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4页。

国学内容在视角上的补充，是对民族文化完整性的认可，“只有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在人民群众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并永远保持强大的生命力”^①。当代国学研究的总体趋势，一是在于传统，二是在于世界性，亦与跨文化民俗学的倡导相吻合。对民俗学而言，在国学框架内汲取文化的养分，也是对自身的丰富。

三、《北京大学学报》中的社会学与民俗调查

通过对学报发表文章的观察，近年来社会学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农村问题和家庭问题，这两大问题也是民俗学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一）农村社会学

对农村的民俗学研究是钟敬文先生民俗学建构的一部分，1998年，在《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一文中他曾谈道，“从我国传统民俗的文化价值及当前所遇到的生存危机看，农村和小城镇的民俗亦应摆在第一位。”^②而我国关于农村社会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社会学者大都对农村民俗有所关注。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运动和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是当时最有名的两大乡村建设运动^③。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社会的经济、体制、结构、思想和行为观念上出现的问题，成为农村社会学主要的研究方向。在北大学报上刊载的相关文章主要有，王汉生《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社区政府：权力与利益的分化》（1992年第4期）；王思斌《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1987年第3期）、《农村发展的组织依托》（1992年第4期）

① 袁行霈：《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47页。

② 钟敬文：《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第224页。

③ 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等；梁钧平《论我国农村社区政企关系的有效模式》（1993年第3期）、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1995年第2期）、刘守英《集体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城市化——北京市郑各庄村调查》（2008年第6期）、王曙光《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经济转型》（2010年第3期）等。

费孝通于1995年在《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总结了他多年来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研究，通过多年来对农村、小城镇和区域发展的观察，他研究了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改革模式，通过大量田野调查获得的翔实资料，提出了乡村改革的思考和途径，并在文中谈到了随后研究方向和重点的转变：“我从农村的微观研究，进入小城镇的比较研究，经过60年的时间，提出了这个更大的课题。这个课题不仅要把全国的经济发展看成一盘棋，而且应联系着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①

中国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是在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农村的民俗学研究同样也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面对农村在时代变革中发生的重大改变，社会学的关注焦点在于结构研究与重构、组织建设与民间资源的充分利用，而民俗的关注重点则在于对深入民众日常生活习俗的深层维护。这种文化血脉上的延续是社会认同的基础，也是维系稳定的纽带，因而民俗学在农村的社会的研究，既是对社会学的补充，也能够成为城市民俗研究的参照。同时，在组织结构研究方面，社会学的组织研究是自上而下的官方机构，而民俗学的组织研究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二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达到民俗社会运作与国家运行相吻合。

（二）家庭社会学

北大学报上刊载的有关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文章大体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农村家庭功能与结构，如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

^① 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14页。

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1983年第3期）、《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1986年第3期）、杨善华《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生产功能的变迁——对中国农村的一个跨（亚）文化比较研究》（1991年第3期）、王跃生《家庭责任制、农户行为与农业中的环境生态问题》（1999年第3期）等；农村家庭伦理关系问题，如张纯元《试论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福利事业》（1984年第4期）、魏英敏《“孝”与家庭文明》（1993年第1期）、杨善华《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2004年第1期）、刘爱玉及杨善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2004年第1期）、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2009年第4期）等文章。

在农村家庭社会问题中，家庭功能与结构的变迁是主要的关注问题，其中家庭功能和形式的改变及其导致的问题也是民俗学密切关注的。1983年，费孝通先生在《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一文中谈到了现代化过程中，基于作者在江村的调查，讨论了我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动，主要围绕亲子关系中子女对父母赡养这一问题。他在文章中谈到了中国传统伦理问题和家庭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家庭结构变动中会产生影响。

而关于传统文化与家庭伦理关系这一问题，大约20年后，汤一介先生在《“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建立和谐的家庭观念需要家庭伦理，而在中国古代，“孝”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并且随着礼制的发展，也成为一种社会规范。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家庭作为社会中的生活单位和生产单位的作用在发生变化。“从我国现实的社会实情看，也许在我国的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终究会逐渐淡出。这就是说，在家庭伦理中‘孝’的内涵必定会有变化”，“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人们家庭的良好的生活状态，将主要应由社会

保障体系来承担”，“但作为我国传统‘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①。即认为即使在功能上家庭并不需要“孝”作为养老保障机制，但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作为传统文化它将依旧续存。

在民俗学的研究中，家庭作为民俗社会构成基础，始终在民俗学研究的视野范围内，传统家庭、宗族的结构方式和成员互动，是最直接与民俗日常生活文化相关联的。传统的中国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承担的许多责任在当代已经被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取代，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养老问题也是其中之一，如何在家庭结构调整、家庭承载社会功能发生变化的时候，在文化上达到软性的过度，是民俗学在家庭研究方面应该与社会学研究互为补充的。

四、《北京大学学报》中的历史学与历史民俗学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原址上存续至今的古文明。在这样文化的孕育中，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供研究，供后人描绘出当时的文化时空。一般的历史研究，多从朝代入手，关注重点常放在上层统治阶层，以正史记载为主要切入点，民间资料为辅。在民俗学研究中，最早由钟先生创立了历史学与民俗学相交叉的历史民俗学。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文中，钟先生提到“一般民俗学只讲以上两种（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不过我认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应该加上历史研究这一条。中国有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不进行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是说不过去的”^②。

在历史民俗学的研究上，钟先生选择了“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结合点，开展对民俗史料的甄别，然后做民俗学的研究”^③。他的主要观

① 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3页。

②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8—49页。转引自：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第4页。

③ 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第5页。

点涉及，第一，五四时期对歌谣、戏曲和小说的搜集整理，“解决了创建资料系统的难题，这是五四传统学术改革的一部分，也成为历史民俗学的起点”；第二，历史民俗学在使用史料时，需要实际接触史料所描述的社会背景和观察人民的叙述与行为，以便取得“第一性认识”，这便是史料与调查的结合；第三，他提出“民俗学者要善于使用无史料的民俗资料，但在从事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时，同时还要结合书面史料做研究，以避免对口述资料人为地曲解，也避免将民俗学研究当作一种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诠释”^①；第四，正确理解本地文化和主体要素是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基础，认识到这一点，对民俗学者正确对待自我与他者、本国实际与外来理论间的关系有帮助。

在北大学报上刊载的有关历史研究的文章中，历史学研究的文章不少，文献考据十分充实，如翦伯赞《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1955年第2期）等文章；阴法鲁《〈诗经〉乐章中的“乱”》（1964年第3期）等；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1980年第6期）等；张传玺《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1984年第2期）和《论中国历代契约资料的蕴藏及其史料价值》（1991年第3期）等。但这其中，真正在内容上重点关注到民间文化或民间资料却并不多，其中张传玺《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和《论中国历代契约资料的蕴藏及其史料价值》两篇文章在关注社会民俗变迁方面涉及较多。

在《论中国历代契约资料的蕴藏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中，张传玺介绍了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契约使用历史，并强调了契约资料在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契约资料的类型主要有三种，“其最可贵者为契约原件，次为见于青铜器、碑刻或一般文献中的录文，再次为含有契约内容的文字资料”^②。在谈到契约资料的价

① 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第5页。

② 张传玺：《论中国历代契约资料的蕴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112页。

值时，作者认为，“中国契约学的任务首先是要研究中国契约自身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此外，契约在政治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民俗史、语言学史、文学史、文字学史上的史料价值及其反映的重要问题也要研究。”^①这当然是对契约学及契约资料的概论，描述了契约在各学科研究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并梳理了现存的契约资料。在民俗学的研究中，在组织民俗和宗教民俗的个案中，对契约材料的研究和运用往往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在董晓萍《寺庙与行业铺保组织研究》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便被体现出来，也是反映城市社会变迁、城市人口流动、城市商业史的重要侧面。

而关于碑刻的重要性，张传玺在《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中做了进一步例证和应用。鲜于璜神道碑是1973年5月在天津市武清县兰城村发现的，关于鲜于璜的家世，《后汉书》并无传录，发现的碑文中记载的鲜于氏祖孙八代，均无文献资料可考，在这个意义上，“璜碑之发现无异为《后汉书》增补了一篇内容翔实的传记”^②。

五、《北京大学学报》中的地理学与民俗学交叉研究

（一）地理学与民俗学的交叉视角

董晓萍等在《民俗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的理念与实践》一文中指出，开展民俗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可能性有三，“第一，在全球化时期，‘文化空间’的概念被翻新使用，用以表达多元文化生存发展的地理地点和历史传统，重塑国家文化主权形象，反对超级大国对中小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文明模式与经济建设的强权控制，寻求文化和谐。第二，现代社会对传统能源和不可再生人文资源的过度采掘和消费，已

① 张传玺：《论中国历代契约资料的蕴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113页。

② 张传玺：《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第47页。

引起高度的关注；强调对地球环境与人类遗产资源共同保护，推行在国家政府可控背景下的节约和保护教育，已形成广泛的共识。第三，在专业领域内，现在地理学和民俗学的交叉术语增多，涉及人文文化、历史景观、地区特征、区域差异、生态环境和气候变迁等各方面，反映了文化传统（含民俗因素）对地理环境、生态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多重影响。”^①由此，展开的以水利为视角的文化空间研究就有了理论上的依据。

将城市文化纳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重要贡献。早在北大学报创刊初期的1956年，侯仁之就在学报上发表了《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表示了对北京城市水利问题的关注，而他对地域文化的地理学视角和研究对民俗学研究相关社会问题有很多启发。文章中谈到了北京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水源变迁和利用问题，简要介绍了北京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以及北京在都市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实际需要的增加和城区的不断扩大，原本永定河水和储量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开始呈现短缺的趋势，地上水来源成为很大的问题，由此，人工渠道、农业灌溉等问题亟待解决。

侯先生的文章是以地理学的视角跟进的，对北京的水源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在文章最后总结了过去一千七百年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水源开发利用的问题，总结了三个方面值得更进一步讨论的问题，“（1）引用永定河的企图，（2）远导昌平白浮泉的尝试，（3）昆明湖水库的修筑。三者有先后相承的关系，这就是说，最初是企图引用永定河，永定河的引用既归失败，又尝试着从‘北京湾’内昌平泉水的导引上想办法。最后昌平泉水的导引也遇到了困难，这才修筑了昆明湖水库。昆明湖水库的修筑，已经把开辟水源的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②。

① 董晓萍、王静爱：《民俗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的理念与实践》，《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第34页。

② 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

关于北京水利的问题，从民俗学视角进行的研究也有案例，董晓萍主要从民俗学的视角开展城市社会组织和市民的用水习惯研究。她指出，“现代民俗学的研究集中在三方面：在农业社会中形成的用水民俗文化的概念、价值观和历史传统，国家水治和民间水治的互动关系，用水民俗进入现代社会的被继承利用的方面。”^①因此，民俗学视角的水利研究，不止于地理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对水资源的空间分析，更在于其空间所带来的文化变迁，讨论由此产生的宗教性公共管理、水治所崇拜的主要神祇、用水模式与城市人口生产的多样化需求间的关系等问题^②。

（二）地域文化视角

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依附于不同地域发展起来的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回溯千年历史，各民族在这片广袤厚实的土地上分分合合，每一片逐步安顿发展起来的土地，都有其性格明确的文化特色，且这些文化、风俗、民情往往依附于地貌生长起来。这些区域从零星发展到相互交融，从互伐混战到和平交流，经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他们的文化也相互辐射、影响、侵略或者打破，生发出新的文化形态，为今天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因此，代代相传下来我们能看到南地浪漫热烈的《楚辞》和北地质朴浑厚的《诗经》，我们能欣赏各地的民族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我们还能看到壮族的长篇叙事诗《布罗陀》等等。从这些珍贵的民俗资料中，能辨认沿海和内陆的地域文化差异。

在地域文化与民俗的关系中，还有一个无法绕过的的问题就是多民族本身的文化。民族学在其研究方向和内容上与民俗学有许多交叉，钟先生在《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一文中曾指出，中国

年第1期，第165页。

① 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第154页。

② 董晓萍：《北京城市社会的民间水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65页。

不同于日、韩、北欧等国，是“一国民俗学”，中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特色民俗，因此，中国的民俗学应该是“多民族的民俗学”，“中国的民俗学既是一国的民俗学，又是多民族的民俗学，或称之为比较民俗学”^①。民族民俗学观点在他的民俗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与侯仁之和钟敬文的观点相呼应，袁行霈将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相交叉，又有新见。2012年，在《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一文中，他谈到地域与文化交互研究的多重思考，该文是《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丛书的总绪论。文中谈到中国地域文化的多源同归与多元互补、文化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地域文化的差异、交流与融合等地域历史文化发展状况，并谈及研究地域文化的意义和宗旨，“有些地区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渐削弱甚至濒临消亡，……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切忌抹杀地域的特点，避免千城一面、万村一形”^②。同时他指出了作者认为的地域文化发展角度。例如他认为应立足于当前的行政区划，以行政区划立卷，并强调了研究地域文化，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特别是“乡邦文献，包括各地的方志、族谱、舆图等”，在强调文献重要性的同时，还肯定了民众创造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活力，“文化绝不仅仅体现在文献中，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化除了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内容之外，还包括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的方式等等，这乃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广大民众所创造的”^③。同时，袁先生还强调了田野调查的必要性，“研究地域文化在重视文献的同时，必须注重实地考察，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资料。只有将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并利用新的考古资料，才能见其全貌。”^④

在袁行霈的笔下，地方志、族谱等民俗志资料都是研究地域文化

① 钟敬文：《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第222页。

② 袁行霈：《关于中国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总绪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8页。

③ 同上书，第20页。

④ 同上。

重要的资料组成部分，也是帮助恢复地域文化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基础。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现代民俗学研究中需要充分利用的部分。

结 语

《北京大学学报》所发表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本文的讨论只是一个初步的开始，但本文所做的尝试是首次进行的工作，仍有其学术价值。本文在不同学科不同侧面的交互影响下，力图找寻并把握住民俗学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研究中可持续发挥热度的重要领域。在全球化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全球化促进了学术的全球交往。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本身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在这一包容性极强的体系、平台和理论研究范式下，多学科的互动能使彼此都得到更有活力的发展，各学科间的研究壁垒的打破，是为了在多元认同下共生共赢。学科框架越是完善，与其他学科间交叉重叠的部分就越引起重视，因此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学科间的交叉部分，不同学科自带的研究视角、方法论间的差别依然不容忽视，但也正因此，多方审视和整体把握对同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便格外容易使现代民俗学创生新的学术火光。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